

国家教委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八五”规划重点项目

中国西北农牧民 政治行为研究

王宗礼 刘建兰 贾应生 著

甘肃人民出版社

GAN SU REN MIN CHU BAN SHE

国家教委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八五”规划重点项目

中国西北农牧民

政治行为研究

王宗礼 刘建兰 贾应生 著

中国西北政治社会问题研究丛书



甘肃人民出版社

中国西北农牧民政治行为研究

王宗礼 刘建兰 贾应生 著

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兰州市第一新村 123 号)

甘肃省静宁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0.75 字数 264,000

1995 年 12 月第 1 版 1998 年 6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1,001—3,000

ISBN 7-226-01567-6/D·112 定价:16.50 元

序

王惠岩

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根本问题。农民的政治观念、政治态度以及政治参与等对国家的长治久安和持续发展有重大影响。由王宗礼等人在经过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撰写的《中国西北农牧民政治行为研究》一书,为读者了解西北地区农牧民的政治态度、政治观念以及实际政治参与等提供了有价值的素材,同时也对有关部门制定农牧区政策、引导和调控农牧民的政治行为提供了一份可资借鉴的重要材料。

政治学既是一门理论学科,又是一门现实性很强的学科。政治学研究必须承担起现实政治关怀的使命。西北地区地处祖国边陲、多民族聚居、宗教氛围浓郁,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该地区农牧民的政治行为往往与民族因素、宗教因素等相互交织,更具有复杂性和特殊性,对西北边疆的社会稳定和祖国统一有着这样或那样的影响。因此,进行西北农牧民政治行为研究有着很强的现实针对性。作者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方法论为指导,吸取西方行为主义政治学的访问法、问卷法、实地设想法等一些具体研究方法,对西北农牧民的政治行为进行了多角度、多层次的透视。作者既注意到了西北农牧民政治行为与全国农牧民政治行为的共同性的一面,又着重研究了西北农牧民政治行为的特殊性的一面;既研究了如政治价值观、政治认知、政治情感、政治认同等“隐性”政治行为,又研究了如政治参与等“显性”政治行为;既描述和分析了农牧民政

治行为的现状和问题,又研究了农牧民政治行为的发生发展和调控对策;既注意了农牧民的个体政治行为,又研究了农牧民的群体政治行为等。可以说,作者在研究方法和研究框架的思考和选择方面是下了一些功夫的,其研究内容也是比较充实的,其研究成果是值得肯定的。

据我所知,就我国目前的政治学研究而言,专门以农牧民的政治行为为研究对象进行比较全面的分析研究的研究成果还不多见,而专门深入研究西北农牧民的政治行为并形成比较系统的研究成果的,这是仅见的一份。无疑,作者的这一工作是具有独创性的。尽管该项研究无论就其研究框架、研究方法还是作者所得出的一些具体结论等,都只是代表作者自己的观点,读者还可以进行争鸣和批评,但作为一个老政治学工作者,我还是为有志于政治学理论研究的年轻一代所取得的任何成果和进步感到欣慰。因此,我愿意为王宗礼等人的这本书作序,以此鼓励他们在政治学研究方面取得更大成绩。

1995年10月20日

目 录

导论:历史和现实的双重启示	(1)
一、了解农民:中国政治生活的底蕴	(1)
二、西北地区农牧民:一般和特殊	(7)
三、政治行为研究:研究农牧民的一个独特视角	(9)
四、研究框架和研究方法的考虑	(17)
第一章 独特的地理和人文背景	(23)
一、广袤而狭小的生存空间	(23)
二、落后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	(34)
三、多元文化的撞击和汇合	(40)
四、挑战和机遇:十字路口的选择	(52)
第二章 政治人格:从臣民、草民、牧民到公民	(58)
一、政治人格:对人们政治行为方式的一种核心分析	(58)
二、臣民政治人格:传统的理想人格形态	(63)
三、草民政治人格:传统和现代人格的双重丧失	(75)
四、牧民政治人格:顺乎又超乎政治的非权力型人格	(82)
五、公民政治人格的形成:障碍与前瞻	(87)
第三章 政治价值观和政治态度	(95)
一、多元化的政治价值观	(96)
二、多层次的政治认知	(104)
三、变动中的政治情感和政治意向	(113)

四、西北农牧民的政治偏见及其表现	(117)
第四章 政治认同:从家族、部落到现代国家	(121)
一、家族认同	(121)
二、部落认同	(128)
三、宗教认同	(136)
四、民族认同	(146)
五、国家认同	(155)
六、政治认同与政治整合	(161)
第五章 政治参与:现状与前景	(172)
一、政治参与:民主、盲从或盲动的显性表征	(172)
二、典型的规范参与:农牧民政治选举行为分析	(176)
三、寻求意志表达:其他的政治参与方式	(184)
四、农牧民政治参与的障碍、前景及政治体系的决策 选择	(193)
第六章 政治社会化:西北农牧民政治人格的形成机制 ..	(205)
一、政治社会化的一般过程	(205)
二、传统政治文化的渗透	(210)
三、家庭:政治社会化的主要途径	(214)
四、政治社会化的其他途径	(225)
五、“山高皇帝远”——政治社会化的缺失	(235)
第七章 群体政治行为	(241)
一、西北农牧民群体政治行为的特点和类型	(242)
二、群体政治行为的生成和发展	(251)
三、群体政治行为的影响及防止	(259)
第八章 政治行为的差异性	(267)
一、跨地区的透视	(267)
二、宗教对政治行为的影响	(273)
三、教育程度与政治行为	(277)

四、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对政治行为的影响	(282)
第九章 政治行为的调控	(288)
一、西北农牧民政治行为:问题与困惑	(288)
二、西北农牧民政治行为调控的目标和原则	(295)
三、西北农牧民政治行为调控的对策	(301)
第十章 政治行为的理性化	(314)
一、政治行为理性化是政治发展的重要内容	(314)
二、市场经济:西北农牧民政治行为理性化的现实起点	(323)
三、发展教育文化事业是西北农牧民政治行为理性化的 有力杠杆	(326)
四、政治体制改革与政治行为理性化	(330)
后记	(334)

导论：历史和现实的双重启示

题记：不了解中国农民，就不可能了解中国社会，也就更谈不上了解中国政治。

中国有 12 亿人口，占世界人口总数的 22%。在中国的 12 亿人口中，农民人口约占全国总人口的 79%。这一不容选择的现实，规约着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决定着中国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基本面貌。它是古老的中华民族走向 21 世纪，迈向世界先进民族之林的现实起点。作为社会科学工作者，我们没有理由不直面这一现实。

一、了解农民：中国政治生活的底蕴

自从 19 世纪 40 年代前后，帝国主义列强的坚船利炮轰开了古老的国门开始，几千年来相对稳定停滞的中国传统农业社会开始了以现代工业社会为面向的转变。这一转变中经一百多年的努力，特别是近十几年来改革开放的强劲推动，已经成为当今中国社会不可逆转的大趋势。尽管这一趋势正在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速度改变着中国社会的基本面貌，但古老的中国毕竟太过古老了，它庞大的人口数量、悠久而古老的传统、薄弱的经济基础、低下的生产力水平以及长期的内忧外患，使得这一转变过程显得缓慢而艰难。虽然人们一致认为，目前的中国社会正处在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具有明显的转型社会的特征，但就中国社会的基本结构而言，农民仍占人口的绝大多数，农村社会仍然

是中国社会的主体,农业作为国民经济基础的地位也依然不容动摇。这些人所共知的事实告诉我们:农村、农业和农民问题在中国仍然具有特殊的意义,农民的状况及其人心向背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是影响中国现代化进程,影响中国的政权结构、政治运行以及政治和社会稳定的关键因素。

恩格斯在论及西欧农民问题时曾说过:“农民到处都是人口、生产和政治力量的非常重要的因素。”^①就中国而言,农民不仅占人口的绝大多数,而且也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重要力量,是农村生产力的极端重要的因素。农业是中国国民经济的基础,这不仅因为农业是工业、尤其是轻工业的重要原料来源,轻工业70%以上的原料来自农业,而且农业还是现代化经济起飞时期的重要资金积累来源,中国国民收入的40%来自农业。农村还为工业提供了巨大的市场。特别是农业关系到12亿人口的穿衣吃饭问题,单是这一事实,就使得农村、农业和农民问题成了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农业的发展,农村的振兴,关键取决于农民的积极性的提高,因此,说到底,农民问题解决得如何,关系到12亿中国人的吃饭穿衣问题,关系到当代中国的最大政治——现代化进程。因而,它是当代中国政治的一大主题。研究现代化问题的学者曾经指出:“一个国家要发展,必须研究农民,对农民缺乏了解造成很多发展计划的失败。”^②《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农业和农村工作的决定》指出:“农业是经济发展、社会安定、国家自立的基础,农民和农村问题始终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根本问题。没有农村的稳定和全面进步,就不可能有整个社会的稳定 and 全面进步;没有农民的小康,就不可能有全国人民的小康;没有农业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整个国民经济的现代化。”这清楚地说明了农业和农民问题的极端重要性。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第295页。

② 〔美〕埃弗里特·M·罗吉斯等:《乡村社会变迁》,第320—321页。

在一个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国家中,农民的政治态度在很大程度上是决定政权稳定与否的关键因素。中国历代王朝大都毁于连绵不断的农民起义,这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单就近代中国而言,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就沉重地动摇了清朝专制统治。国共两党的斗争结局也深刻地说明了农民态度的重要性。正是因为国民党统治集团代表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在解决攸关绝大多数农民态度向背的土地问题上未能拿出实质性的方案和步骤,因此彻底地丧失了农村中广大无地或少地的农民的支持,从而加速了国民党政权的覆灭。“谁能控制农村,谁便能控制国家。”^①这一点在中国具有特别的说服力。在中国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农村社会面临着巨大的变迁,农民的转化、分化和重组不可避免。对农民来说,这是一个希望与失望并存、挑战与机遇并存、利益和代价同在、躁动和无奈共生的特殊时期。矛盾的处境和矛盾的心理,使得转型期的中国农民必然地处在极不稳定的状态中,正如研究现代化过程中政治稳定问题的权威学者亨廷顿所说:“城市的角色是固定的,它永远是反对派的来源,农村的角色是变动的,它可以是稳定的来源,亦可以是革命的来源。”^②可见,转型期的农民状况对政治和社会稳定具有重要影响。认识和研究转型期的农牧民,是我国政治管理中的一个突出问题。

从我国目前农村社会和农民的基本状况看,呈现出以下一些基本特征:

1. 农民的转化、分化和重组持续进行,困难丛生。随着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和其他一系列改革措施的配套实施,千百年来束缚在土地上的农民被解放出来了,农民的积极性空前高涨,人多地少的矛盾暴露无遗。乡镇企业的崛起,吸纳了大批农村剩余劳动

^{①②} [美]萨缪尔逊·亨廷顿《转变中社会的政治秩序》,台湾黎明文化事业公司出版,第382、381页。

力,城市改革的深化和经济的快速增长,提供了大量就业的机会,千百万农民走出家门,奔赴城市打工谋生,个体经营和私营企业勃兴。传统农民已开始分化出了农业劳动者阶层(承包集体耕地、从事种植业和养殖业劳动)、农民工(户口在农村,长期在工矿企业和服务业中打工为生)、农村个体户和私营企业主(属于小私有者,收入一般高于普通农民的几倍,甚至几十倍)、乡镇企业和乡村管理人员、农村知识分子(户口在农村,但从事教育、科技、医药、文化、艺术等职业的农村脑力劳动者)。农村剩余劳动力通过乡镇企业和第三产业大量地转移,近几年来已经转移了7000多万。农民的转化、分化和重组趋势,一方面反映了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深化,另一方面也使得传统农民的观念、思维方式、生活方式等发生了深刻的变迁,农村社会的矛盾和冲突日益明朗化。在中国,还有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化困难,大致仍有1亿多农民处在隐型失业状态,这是中国农民问题的一个突出的问题。

2. 农民正处在空前的躁动中。一方面改革开放的深化,平均主义分配体制的打破,强化了农民的利益动机,农民发财致富的心情十分迫切,另一方面却苦于发财无路、致富无门;随着大批农民涌向城市和大众传播媒介的普及、城市的繁华竞逐,城市的灯红酒绿强烈地挑逗着农民的欲望,但对大多数农民来说只能是望洋兴叹,无可奈何。从土地的束缚中解脱出来的农民在经过最初的欣喜和激动之后,很快便发现他们向往的城市已人满为患了。他们盲目流动、左冲右突,寻找着出卖自己劳动力的场所。农民在和城市人的对比中,获得了强烈的自我意识,明确地意识到自己和城市人之间存在的巨大反差。正咀嚼着改革开放初期甜头的农民,还没有来得及细细品味,却不得不面对改革开放快速推进所带来的代价和后果,农民中普遍滋生着一种相对剥夺的感觉和心理。城市与农村之间,东部和中西部之间,人与人之间的不平衡,使自古以来就崇尚平均的中国农民产生着强烈的心理失衡。改革开放在不同程度上

改善了农民的生活,对于大多数农民来说温饱问题已经初步解决。相当数量的农民已经过上了小康生活,还有些农民则成了腰缠万贯的富翁。但随之而来的是需求层次推进规律开始发挥作用了。农民又开始寻找新的目标,产生新的渴望和新的需求。新的需要甚至比旧的需要更难满足。以上诸端,使得转型期的中国农民充满了渴望、焦虑、失望、徘徊。一句话,中国农民正处在空前的躁动中,要成功的驾驭它,就必须深入地研究和了解它。

3. 农村问题和农民问题日益突出。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在停滞的农村社会造成了连锁反应。一石激起千层浪,农村社会的多元化格局正在形成,农民中蕴藏的能量开始释放,传统农村社会的整合机制遇到了现代力量的挑战,农村改革中的政策效应开始递减,农村发展中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开始暴露,农民不满足现状的情绪正在滋生。近几年来,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化难问题、民工潮问题、农民负担加重问题、农民收入增长缓慢问题、农田撂荒、粮食播种面积下降问题、农村基层政权组织软弱无力问题、宗教问题、封建迷信活动蔓延问题、农民集团犯罪率和个体犯罪率上升问题等等,都是农民问题和农村问题的突出表现。这些问题的汇合和集聚,在农村社会形成了一种涌动的潜流,构成了对农村社会发展和稳定的威胁。而这种种问题的此起彼伏,实际上左右和反映着农民的政治和社会态度,并通过农民的政治和社会态度而对现实政权和政治运行产生影响。

中国需要稳定,稳定是发展的保障。中国稳定的最深厚的基础在于农村和农民的稳定。“无农不稳”、“无粮则乱”深刻地反映了中国治乱的一条基础规律。为了保持稳定,党和政府必须注意解决农民问题。而农民问题的实质是其物质利益问题,党和政府的施政过程应将满足农民的物质利益问题放在重要位置考虑。江泽民总书记1992年12月24日、25日在武汉主持召开的六省农业和农村工作座谈会上也明确指出:“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村稳定是

整个社会稳定的基础,农民问题始终是我国革命、建设、改革的根本问题。”因此,了解农民,研究农民,对于做好农村工作、保持稳定大局意义非同寻常。

毛泽东和邓小平深谙中国农民问题的重要性。中华民族现代史上两次重大转折都与农民的推动有密切关系。在民主革命时期,当一些有志于中华民族解放事业的仁人志士纷纷走出国门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的时候,当中共的一些早期领导人囿于苏俄的经验而热衷于搞城市暴动的时候,当国民党人纷纷指责农民运动“糟得很”的时候,毛泽东却重新走进了农村,发现了农民中蕴藏的巨大革命力量,讴歌农民运动“好得很”,认为“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①从而找到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政权的中华民族解放的道路,为中华民族的解放奠定了基础。

历史发展到20世纪70年代末,当极左路线的余波尚热衷于建造“十来个大庆”、“十来个鞍钢”的时候,以倡导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而著称的邓小平同志又一次将目光移向了农村。安徽省凤阳县的农民率先自发地搞起了土地承包责任制,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邓小平同志敏锐地看到了农民这一创举的意义。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深刻地改变着农村和全国的面貌,由此启动了中华民族的现代化历程,实现了中华民族近现代历史上的第二次腾飞。可见,农民在某种程度上是左右历史、左右政局的巨大力量。

谁不了解这一点,谁就不了解中国国情,谁不研究农民,谁就无法了解中国政治。鉴于此,有着长期农村生活经历的我们,不揣浅陋涉入到了这一领地,以为人们更好地了解农民、理解农民,为党和政府制定方针政策提供一些素材和我们的思考。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6页。

二、西北地区农牧民：一般和特殊

西北地区是中华民族的发源地之一，其中陕西和甘肃的部分地区还曾经是中华民族活动的中心地带，有着发达的农耕文明和悠久的文化传统。但这一地区又是多民族聚居地区，是历史上民族融合和民族冲突的重要场所；也是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要冲。因此，就这一地区农牧民的整体状况看，它既有着和整个中华民族农牧民一脉相承的共同传统和一般属性，又有着不同于我国其他地区农牧民的特殊个性，是中华农牧民一般性和西北地缘特殊性的统一。它在以儒家文化为根基的人生观方面，在受自然经济所规定的保守、封闭方面，它在对社会政治方面的大一统意识、忠君爱国意识、清官期盼意识、重义轻利意识等方面，都与其他地区的农牧民有着很大的一致性。但它的特殊性也很明显，主要的有：

1. 生产方式更加落后，所处地域更加封闭，观念更加滞后和陈旧。尽管如我们前面所说，这一地区在历史上曾经是中华民族活动的中心地带，是中国对外经济文化交流的桥头堡。但到进入近代以来，中国的政治经济中心逐渐向东南移动，欧风美雨也首先吹打着东南沿海，东南沿海一带得开风气之先，新思想、新观念、新式教育首先发轫于沿海一带。而西北地区则由于深居内陆，交通不便，地理环境相对封闭，民贫地弱，产出不丰，自我发展能力较差，因而当其他地区正在萌动着资本主义幼芽的时候，当其他地区正在逐渐更新观念的时候，西北地区仍然在传统的樊篱中步履蹒跚、踟蹰不前。相对于我国其他地区，特别是东南沿海一带而言，西北地区的农牧民似乎更痴迷于过去的传统，更不愿意离开生于斯长于斯的黄土地。他们对外面的天地羡慕但却止于无奈，缺乏追求的勇气和激情，对于自己的现状虽不一定知足，但却不去改变。命定观、迷信观非常普遍。改革开放的今天，当其他地区的农牧民正在走南闯

北,以前所未有的姿态驾御人生,把握未来之时,而西北地区的农牧民总的来说仍然安贫乐道,附着在土地上寻求着“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人生境界。就连遍及全国的打工仔、打工妹中也很少能觅到西北农牧民的身影。从这些现象中人们可以发现,西北地区的农牧区落后的生产方式和封闭的生存空间,严重地制约着农牧民观念的演进和现代人格的形成。

2. 西北地区的农牧民群体的结构较为复杂,价值观的多元化色彩明显。西北地区是我国多民族聚居地,几个主要的少数民族有着自己相对独立的生活空间、有着各自共同的经济生活,共同的宗教信仰和共同的心理素质,这就造成了西北地区各民族既相互联系、又相对独立的格局。在西北地区的农牧民中,从从业结构上看,有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从事牧业生产的农牧民,还有从事乡镇工业的农民工等;从民族结构看,有汉、回、藏、维吾尔、哈萨克、土、保安、撒拉、柯尔克孜、东乡等几十个民族;从宗教信仰结构看,主要有伊斯兰教、藏传佛教、道教、佛教等,每一宗教内部还有若干教派;从社会层次上看,有小康型、温饱型、贫困型等几个层次,其中贫困面较大。由于民族之间历史传统不同、生活方式不同、宗教信仰不同,因而各民族的价值观也有明显差异。伦理型价值观、实惠型价值观、宗教型价值观等都有分布。相对于我国另一个多民族聚居地的西南地区而言,西北地区农牧民特征也很明显,如民族成份不同、生活方式不同等,但真正对政治生活有影响的不同,则是西北农牧民、特别是少数民族农牧民有更加强烈的宗教意识,而且这些宗教历史悠久,影响面很大,与国外有较深刻的渊源关系等。

3. 西北地区的农牧民生存条件更加严酷,生活水平更为低下,受教育水平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西北地区山大沟深、荒漠广布、降水量较少、水资源短缺、土地贫瘠、水土流失严重,农牧民生存条件极为严酷,生活水平较低,为了维持温饱,农牧民的付出比其他

地区更大。在西北大部分地区,维持生存、解决温饱的问题还很突出,农牧民的主要精力尚集中在维持生存方面,加之生活水平的低下,大大限制了农牧民的眼界,也限制了农牧民多方面的需求。农牧民的受教育状况也受制于农牧民的物质生活条件,农牧民中特别是青壮年农牧民中文盲和半文盲比例较高,而且这一比例还有上升的势头。受教育程度低下导致人口素质下降,而人口素质的下降,必然不利于发展经济社会事业,从而又影响到教育程度,如此恶性循环,严重地困扰着西北地区的农牧民,使其在贫困和愚昧中艰难地跋涉。

对于这样一个特殊群体的分析和把握,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中国农民,更好地了解中国国情,从而有利于我国政治社会的稳定和现代化建设事业。

三、政治行为研究:研究农牧民的一个独特视角

(一)西方政治行为研究的缘起与发展

对农牧民的研究可以从多种角度进行,如可以研究农牧民的社会结构、农牧民的生活方式、农牧民的风俗习惯等等。用政治学的眼光,我们所关注的是农牧民与政权的特殊关系。如前所述,农牧民的政治社会态度是决定政权稳定与否的关键因素,因而我们将着眼于以政治态度为核心的农牧民政治行为的研究。

政治行为是指“与治理过程有关的人的思想和行为。它既包括可观察到的人的行为(投票、反抗、正常秘密会议、竞选),也包括人的内心反映(思想、知觉、判断、态度、信仰)”^①。前者,我们称之为显性政治行为,后者我们称之为隐性政治行为。同时,“政治行为也

① [美]杰克·普拉诺:《政治学分析辞典》中译本,第105页。